

范明生
陈超南 /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东西方

文化

比较研究

集六位资深学者研究之功力，从整体上比较研究东西方文化各自
基本特征和历史脉络，又在语言、教育、伦理、政治、宗教、文
学和哲学等领域加以展开，具有知识启示智慧、智慧提升知识的
特点，有助构建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



范明生 陈超南 /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东西方

与
北

比较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 / 范明生, 陈超南主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12

ISBN 7-5444-0980-5

I. 东... II. ①范...②陈... III. 东西文化—比较
文化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3926 号

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

范明生 陈超南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2.5 插页 4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本

ISBN 7-5444-0980-5/G·0803 定价: 69.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言——文化自觉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味着中华民族自觉向先进文化转型。所谓“自觉”是指意识到它的存在,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及它在整个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对先进文化的自觉,自觉地意识到中国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国家主流文化形态,它体现了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和意志,促进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文化条件和精神支撑,是建构当代中华文化的崇高历史使命。这种先进文化的自觉构建,正深深熔铸和焕发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首先,自觉意识到构建中国先进文化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其目的是在中国缔造“和谐社会”。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来增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加强和谐社会的政治保障,还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来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而这种和谐社会的建设,又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人是创造和享用文化的主体,所以中国先进文化要“以人为本”是不言而喻的,它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强调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草案中,首次

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正是体现了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的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科学设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其次,自觉意识到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并存中,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反对“文化冲突论”,提倡诸文化—文明的共存。这不仅关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发展,而且还关系到如何正确处理不同文化—文明间的“冲突”或“共存”。随着冷战时代告一段落,广义的文化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上升了,不仅不同文化间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在不少地区,文化冲突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成为国际关系的新焦点,甚至导致局部地区性的流血冲突和政治对立。文化因素是国际关系中传统的变量,它在不同时期中的重要性不尽相同。一般的情况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占主导地位时,文化因素的作用就小,反之就大。冷战告一段落后,文化因素的敏感性大为增加,从而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当今在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新帝国论”认为,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不可能共存共荣和谐相处,只能引起敌对性冲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他在美国国际政治权威刊物《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发表的论文《文明的冲突?》^①中强调:随着冷战的结束,今后世界上的冲突,主要不是政治的、经济的,而将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他这里所讲的文明的冲突,主要是指

^① 就塞缪尔·亨廷顿而言,“文化”、“文明”是同义语。见其继《文明的冲突?》后发表的论文《再论文明的冲突》,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

文化、宗教和种族间的冲突：

“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割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和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①

认为伊斯兰与儒家文明是引起文明之间冲突的力量，并一再将矛头指向中国：

“潜在的、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②

“令人可信的潜在敌人是中国，它在理论上仍奉行共产主义（即使在经济实践上并非如此），显然实行专政而不尊重政治自由、民主或人权，经济富有活力，公众民族主义情绪日益上升，持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其军界和另一些精英群体明显以美国为敌，凡此种种使它成为东亚的崛起中的一霸。”^③

诸如此类的“中国威胁论”，就美国而言绝非个别。被亨廷顿誉为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大师中的佼佼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几乎持相类似的观点：

“在 21 世纪早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的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中国将比 20 世纪美国面临的任何一个潜在霸权国都更强大、更危险。……况且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比美国还强大的超级大国。”^④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 年 10 月号，总第 19 期，第 5 页。

② 塞缪尔·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 年第 1 期。

③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8 页。

④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43～544 页。

这些观点支持了小布什政府采取的遏制和延缓中国崛起的政策。即便这样,亨廷顿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有高度文明自觉的: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 from 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具有各种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①

4 中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不仅认识到当今世界存在着诸多不同而又相互竞争的文明—文化,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华儒家文化思想的精髓,提出了化解“文明的冲突”促进“文明的共存”的理论。孔庙大成殿前的“中和位育”四个字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和基本价值取向,它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宽容和文化共享。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原意是以其仁、礼统一的学说,作为协和各种意见的基本准则。现在我们将这种理念应用到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民族、文化—文明的共处上,承认“不同”,但是要“和”。只强调彼此文化的“不同”而不能“和”,那就只能共同走向毁灭。因此,“和而不同”是当今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在全球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正是文化自觉的高度体现。热爱本民族的文化,同时真心实意地尊重异民族的文化;不以本民族文化为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断定其“糟粕”和“精华”。因此,盲目崇拜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文化,妄自菲薄中华文化固然是错误的;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甚至敌视西方文化,同样也是片面的。因为,不论哪种文化—文明,在不同程度上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其精华和糟粕,因此对随着改革开放而涌进来的异文化,既要“理解”,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又要有所“选择”。这正是中国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费孝通所提倡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①。“和而不同”也是中国的外交理念，以此处理随不同文化而来的复杂国际关系。早在2002年，当时中国国家主席访美时，就引述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以比喻中美关系。接着，中国国家总理2003年12月访美时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又申述了这种“和而不同”的外交新理念，声称：“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他还历数古代长城、丝绸之路和郑和下南洋，说明中国人酷爱和平的文化品格；“和而不同”主张用平等包容的精神，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并强调指出：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和而不同”则强调各民族共生共长、共同发展。以此眼光看世界就是要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允许多种声音而不只是强调一种声音，国家和民族无论贫富、大小、强弱、先进还是落后，都要相互尊重，共同发展^②。

5

“和而不同”的理念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强烈愿望和热切追求，提供了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体现人类共同智慧的思维模式，同样也提供了人类共同向往的世界和平图景。因此，“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是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斗争的有力武器，是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和正常国际关

① 详见费孝通《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见《思想战线》2001年第6期）；《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见《群言》2005年第1、2期）等文章。

② 详见温家宝2003年1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

系的有力思想武器^①。

再次,自觉意识到综合创新熔铸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华文化的复兴和转型事关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自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外患内战不断,导致整个国家、民族及其文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其真相正像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当时在文化转型上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倾向,一种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另一种是以林则徐、魏源、严复等为代表,主张积极引进西方文化,设计改造中华文化的蓝图。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开始有了复兴和变革中华文化的自觉。其中陈独秀、李大钊发表的一系列有关的论述,特别是瞿秋白在20世纪20年代初,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变革,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才为中国的文化变革指明了方向。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中国文化变革的选择与社会发展道路的正确抉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明确地揭示了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经正在复兴着中华文化,并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②。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先进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表明复兴中华文化的自觉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十六大上,将这种先进文化提到很崇高的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

① 黄仁伟、张来春:《试论中国和平战略中的新观念》,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6期。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706页。

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并揭示出了这种先进文化的具体内容和发展方向:“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与此相应,中国学者们也对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已故学者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①。其主要主张可以概括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道路,即以中国古典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激发现代化的异体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中国现代化为主体目标,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综合创新之路,不仅是中国文明现代化的新模式,而且意味着是世界文化中的一种新类型:它既不同于西方的近现代文化,也不同于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文化。走综合创新之路,意味着中国将以开放的态度和博大的胸襟,广泛借鉴东西方现代先进国家的正反历史经验,并在借鉴中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有所升华。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展望自觉综合创新的中国先进文化的前景,它必将以融会东西、综合创新、后来居上的创新姿态进入全球文化大熔炉。

再者,自觉意识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高度相统一。人

^① 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本书主要参照《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论文化的综合与创新》,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张岱年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507页;《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与王东合作),见《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5期。

类所创造的任何文化—文明,都是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部分组成的,我们正在建造的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不仅要实现经济繁荣,而且还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必须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上,而且还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上。当今的实践告诉我们,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是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两者是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不可分割的。精神文明的发展,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经济建设搞好了,生产力发达了,就会给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更充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将精神文明看作是物质文明自发产生、形成的派生物和附属品,因为精神文明的形成,特别是其发展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只有两种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能成就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高度凝聚力的伟大中华民族。在世界单边化的严峻形势下,更要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因为它关系到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同当前我国物质文明的发展成就相比,精神文明的建设相对薄弱,面临严峻的挑战。实践证明,民族精神及其凝聚力等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优秀精神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但是,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

滥；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还有，自觉意识到在“先进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扬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发展“先进文化”，就是要发展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它必然要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互相激荡，甚至冲击，中国文化只有在其中与时俱进才能保持生命力。中华文明是整个世界诸古文明中，唯一始终一脉相承绵延五千年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并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地理环境中，长期保持其整体的统一，从而呈现出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特点。就中华文明的古代形态来讲，其典型特点之一即，它既是原生形态，又是持续辉煌的；从公元前8世纪到前3世纪间，与西亚、北非、印度等古文明，共同进入其核心时期，但是其他诸古文明由于不断受到异族入侵等而相继败灭，唯独中华文明依然绵延不绝屹立于东方。只是1840年以来，因晚清王朝的腐败和列强的侵略，才陷于几乎亡国的绝境。正因为这样，导致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既要反对故步自封盲目自大的态度，又要反对悲观失望的情绪。就目前而言，前者同样值得警惕。由于当今中国近二十年来经济上持续高速发展，西方又盛言“中国崛起”。以致国内个别有影响的学者颇为沾沾自喜地倡导陈腐的历史循环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妄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①。

中国的确有辉煌繁荣昌盛的过去，古代曾经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经

^① 季羨林就此论点，曾发表过多篇论述，这里主要依据他在《东方论坛》上的文章《东学西渐与东化》。并请看他为《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一书所写的序言。

济实体。著名的荷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近年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一直是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在宋朝的末期,中国无疑是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实体^①。根据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统计,中国经济在1799年达到顶峰,当时的GDP占全球的44%,这个比例比今天的美国占全球的比重还大一倍。而根据美国高盛集团亚洲区董事总经理的统计,这个“世界最大”一直保持到1840年,而在此之前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当今中国的“崛起”,或更准确地说中国的“复兴”,也越来越获得有识之士的认同。其发展前景更被人们看好。正如美国、日本政策研究所所长、东亚问题专家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所说的那样:“中国日益发展的经济实力在当今世界上是有目共睹并博得普遍赞赏的。不过,正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及其在全球权力平衡中将产生的影响使得美国和日本忧心忡忡。”^②也许正是诸如此类的现实和发展的前景,促使国内个别学者对中国文化萌生妄自尊大的心态,在新世纪之初就宣布什么:“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③这种论调不仅是主观武断背离客观现实的,而且是妄自尊大不负责任,甚至是危险的。它不禁使人想起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时,于八月十九日颁发给他的敕谕中的语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在“十六大”提出,如果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中国的GDP到

①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详见查默斯·约翰逊:《接受中国的崛起(上)》,《读书》2005年第6期。

③ 季羨林:《东学西渐与东化》,见《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

2021年将达到6.6万亿美元,届时中国在人口、国土、经济、军事、战略等方面,都会更有保障。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理智、清醒的科学态度。实际的国情是,今天我国仍未统一,人均GDP仅为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科技水平仍然落后,国防实力仍然不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人欺压,历史没有留给我们任何喘息的机会,经济必须保持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才能生存下来。我们经济增长模式不够先进,中国经济是脆弱的;尤其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极严重。在2005年1月24日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的专家们对全球146个国家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估,并发表了《环境可持续发展报告2005》,中国仅列在第133位^①。在这种情况下,妄谈什么东方文化(实际指“中华文化”)“取代”西方文化或“统治”世界,无异痴人说梦,危害极大。我们必须在实施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注意传统中华文化向“先进文化”的转型,既要有只争朝夕的迫切心态,又要有健康的心态和精神素质,特别是要积极发扬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最后,自觉意识到维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安全。综观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起、发展和强盛,不仅有赖于经济繁荣,还有赖于以一定的文化—文明为其依托;一旦丧失了这种精神依托,该特定的国家、民族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根基。所以,文化的安全问题,是极其重要的课题。在这点上要做到“文化自觉”更非轻而易举。被认为是诠释美国文化模式权威的爱德华·斯图尔特(Edward Steward)和密尔顿·贝内特(Milton Bennett),认为文化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真正根源,同时又强调文化的自觉并非易事,因

^① 详见潘家铮:《对“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再思考》,《群言》2005年第3期。

为文化往往被内化成思维和行为的模式而被人们视为一种习以为常、自然而然的东西^①。所以,自觉维护本民族及其国家所依托并赖以生存的文化的的天性更是难乎其难。改革开放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像潮水一般地涌入中国,其中宣扬美国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文化正在影响我国青年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尤其是其打着“自由传播”的旗号通过强大的互联网传播大量不利于我国安定团结的甚至颠覆我国安全的信息;而我国上网的用户虽仅次于美国已逾亿户,但在互联网上我们的中文信息极其有限,在文化产品贸易中存在着较大的逆差。因此,自觉复兴、发展我中华文化以确保文化安全是当务之急。在维护文化安全问题上,采取消极封闭、退缩的方式无济于事,而要坚信中华文化“有容德乃大”(《书·君陈》)的优越性和优良传统。尽管中国近代化萌芽超前,起飞滞后,但厚积薄发的后发优势,却有可能使中国广泛吸收世界文化的丰富营养以及西方文化的最新文明成果,从而使中国现代化起飞呈现出持续发展的前景;这就需要强调中华文化创造现代新型主体性,即自觉维护我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只有文化上的这种主体性,才能确保“先进文化”的安全性,既不应拜倒在古人面前,更不应匍匐于洋人脚下。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和时代的主潮,既不是西方压倒东方,也不是东方压倒西方。正如张岱年所说的,世界新型文明的主要潮流,很可能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对话,综合创新,出现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的世界新型文化—文明。而在这个过程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中华新兴先进文化,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这种重要性将与日俱增,它将在更高阶段上超越汉唐盛世的

^① 参看斯图尔特、贝内特合著:《美国文化模式——跨文化观视野中的分析》“引言”,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华夏文化。这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就曾这样预言过。后者于1932年为其著作的中译本所写的“序”中,就明确地指出:“我与罗素和欧洲许多旁的见解清明的人具着同样坚决的信念,以为中国一定要领导亚洲大陆文明底进步;亚洲与小小的欧洲相比,在好多方面都是更较重要。”^①时隔七十余年,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近年来在其精心撰写的著作中,以超越欧洲的世界眼光探讨了当前国际关系现状及其未来的走势,特别是对几个世界强国和强力集团未来力量的消长趋势进行了分析,并揭示了谁是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他批评美国人和某些欧洲知识分子,对于在长达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文化缺乏尊重,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激烈指责中国,而不去反思他们自己对印第安人的灭绝、奴隶制和南北战争、越南以及纳粹时期;而中国,这个伟大国家,三千多年来似乎是一个例外,也许这正是这个国家能够延续如此长久的一个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历来满足于其他国家对之表示尊重。指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极力支持台湾同祖国的实际分裂,致力于对亚欧大陆的控制。认为中美两国的文化、传统和特点如此不同,而双方彼此缺乏了解以及对对方历史的认识。因此,必须估计到,既成的超级大国美国和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中国之间将进行公开的竞争。经过缜密的研究,施密特预测:“我对当今和明日世界的分析清楚地让人认识到,中国必然属于赢家。”^②无独有偶,近来连美国自己的学者也有相类似的观点。例如,美国学者查

① 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汉文译本序,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② 详见赫尔穆特·施密特:《未来列强——明日世界的赢家和输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并参看2005年7月27日第88期《中华读书报》有关报道《德国前总理眼中的中国》。

默斯·约翰逊告诫日、美不要企图用军事力量阻止“中国作为一个富裕而成功的国家之崛起”，“整个世界需要平和地接受中国的正当权利——其中包括任何其他国家须停止使台湾问题军事化”，如要重演 20 世纪中日冲突，“所不同的只是，这一次美国将未必属于赢的一方”^①。

① 查默斯·约翰逊：《接受中国的崛起（下）》，见《读书》2005 年第 7 期，第 37 页。